

## 戰後臺灣高校《詩經》 教學生態的初步觀察

車行健\*

### 一、教學實況下的《詩經》傳承

早在春秋時代，《詩經》便已經成為貴族學習的教材，如《國語·楚語上》記載申叔時曾對楚莊王太子的教育方針提出如此的建議：

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sup>1</sup>

其實在當時對《三百篇》的學習，不僅如申叔時所強調的「擴大眼界，增長知識，明白道理，樹立宏大的志向」等偏向基礎知識和人格修養層面的教授內容<sup>2</sup>，此即朱自清(1898-1948)所謂「教詩明志」<sup>3</sup>；且更是具有顧頡剛(1893-1980)所歸納出的典禮、諷諫、賦詩和言語等實際用途<sup>4</sup>。誠如《漢書·藝文志》所言：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sup>5</sup>

---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sup>1</sup> [春秋]左丘明撰，[吳]韋昭注：《國語》（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卷17，頁528。

<sup>2</sup>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7。

<sup>3</sup> 朱志清《詩言志辨》將申叔時這段話列入「教詩明志」一節中，且以為「耀明其志」指受教人之志，就是讀詩人之志（見氏撰：《詩言志辨》，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上冊，頁210-211）。這樣的教導活動顯然是以修身為主。

<sup>4</sup> 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古史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翻印），第3冊下編，頁322。

<sup>5</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集注：〈藝文志〉，《漢書集注》（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卷30，頁1755-1756。

這樣的技藝素養，對當時的貴族士大夫階層來說，是不可能不透過學習來掌握的。

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更「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sup>6</sup>，開啟了中國的平民教育。《論語》中多記有孔子與弟子教授研習《詩經》的生動紀錄，讓後人得以窺見孔門教學實況下的《詩經》傳承情景。在《論語》中保留了十九則與《詩經》有關的章句<sup>7</sup>，其中涉及孔門師生教授學習《詩經》的內容，主要有五則，如與子貢論《詩》，稱讚子貢「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又與子夏論《詩》，亦稱許：「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從中可以看到，孔子一方面對學生在學習時，具有觸類旁通的敏銳感悟能力的讚賞；另一方面則是，表現出身為師長的他從中獲得教學相長所感到的喜悅。又如孔子對兒子伯魚有「不學《詩》，無以言」（〈季氏〉）的提醒，亦對弟子發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的告誡，顯現出孔子相當注重言語的實用能力，這種能力正是自春秋以來，士大夫階層從政的重要技能。此外，孔子為了強調學《詩》的重要性，還向弟子提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這樣的整體《詩》學觀。在實際的教學生態中，孔子不但為《詩經》的傳授奠定堅實穩固的基礎，更為以儒學為本位的《詩經》學的開展和弘揚，賦予了內涵和指引了方向。

進入漢代之後，作為儒家六藝之一的《詩經》，備受崇隆，朝廷為之立博士和置博士弟子員，一時傳習大盛。史傳關於《詩經》傳承及與之相關之學校、設施、制度和學風等方面之記載，皆頗為豐富，但涉及教學實況之描述者，一般並不多見，較令人印象深刻的，莫如西漢昌邑王師王式在教授時「以《三百篇》諫」，《漢書》記述曰：

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

<sup>6</sup>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孔子世家〉，《新校本史記三家注》（臺北：鼎文書局，1993年），頁1938。

<sup>7</sup> 相關討論可參糜文開〈論語與詩經〉，收入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臺北：三民書局，1988年），續集，頁374-389。

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sup>8</sup>

王式這個例子常被視作漢代經學能夠通經致用的典範，皮錫瑞(1850-1908)以之與「〈禹貢〉治河」、「〈洪範〉察變」、「《春秋》決獄」相提並論，所謂「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sup>9</sup>。但單從教學的角度來看，王式對昌邑王的《詩經》教授，無論如何，都很難說有取得多少成功的效果。王式以教為諫的方式，適足以作為漢人通經致用的反面例證<sup>10</sup>。

史稱有「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等巨大成就的東漢經學家鄭玄(127-200)，其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sup>11</sup>。其書雖已亡佚，然透過輯佚，猶可見其梗概。其中保留了不少鄭玄回應弟子對《詩經》的提問所做的回答，據此略可想見鄭玄門下教授《詩經》的景況。如弟子張逸對〈鄘風·定之方中〉首章「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毛傳》的注解「楚宮，楚邱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有疑，便向鄭玄詢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鄭玄回答他說：

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sup>12</sup>

皮錫瑞嘗為此書作疏證，其〈自敘〉不但對鄭玄為學精進的精神表示歆服，更對其教誨學生的態度給予高度的肯定：

予治鄭學有年，念是書可與諸經注義參證，以攷鄭君生平學術先後異同之

<sup>8</sup> 班固撰，顏師古集注：〈儒林傳〉，《漢書集注》，卷 88，頁 3610。龔遂在勸諫昌邑王時，亦屢及於《三百篇》，如其謂：「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又昌邑王即位為帝後，「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眾多，如是青蠅惡矣。』」（《漢書集注·武五子傳》，卷 63，頁 2766）

<sup>9</sup> 〔清〕皮錫瑞撰，周子同注釋：《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 年），頁 90。

<sup>10</sup> 周子同(1898-1981)在《經學歷史》注本的〈序言〉中，就嘲諷皮錫瑞的說法為「非愚即妄」，他認為六經和致用的相關度，不僅相去很遠，而且根本上還是大疑問（同前註，頁 12-13）。然其說法也失之偏頗，不能完全一概而論。

<sup>11</sup> 以上俱見〔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張曹鄭列傳〉，《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 年），卷 39，頁 1212-1213。

<sup>12</sup> 皮錫瑞：《鄭志疏證》（臺北：世界書局，1982 年影印光緒己亥年長沙思賢書局本），卷 3，頁 14a。

故，且知古人之學與年俱進，常有欲然不滿之意；而於弟子問難，又常有殷然誨人不倦之心，皆後學之所宜法也。<sup>13</sup>

後學當中與鄭玄情況最相近，且甚至名聲、影響更超乎鄭玄的朱熹(1130-1200)，其語錄中亦保存了大量在《詩經》教學現場中與弟子相詢答的精彩言談紀錄，如：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

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

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厲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憫）

又如：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

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

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廝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廝殺，明日重新又殺一番！」（憫）<sup>14</sup>

看來朱熹的教學極為嚴格，既要求學生讀得精熟，又提醒他們須廣泛閱覽古注。且其教學，善用比喻（第一則甚至連用兩個比喻），而且講課聲情並茂，很難不讓受教者印象深刻。

隨著近代教育體制的轉變，《詩經》的傳授也從傳統的國學、書院或私塾的場

<sup>13</sup> 皮錫瑞：〈自序〉，同前註，頁 2a。

<sup>14</sup> 此二則皆見於〔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卷 80，頁 2087、2088。

域中，騰籠換鳥式地進入各級學校中；尤其高等院校中的中文（國文）系所中的專業課程，更是《詩經》傳授的重要基地。南京大學中文系名師程千帆（1913-2000）早年就讀於南京金陵大學中文系時，曾上過黃侃（1886-1935）的「詩經」課，他晚年時是如此回憶這位開創章黃學派的學術鉅子教授此課的情況：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下午，天氣很陰沉，我在金陵大學北大樓朝北的一間教室裏，在聽季剛老師講《詩經》。老師晚年講課，常常沒有一定的教學方案，興之所至，隨意發揮，初學的人，往往苦於摸不著頭腦。但我當時已是四年級的學生，倒覺得所講勝義紛陳，深受教益。可是老師講書，也並非完全從學術角度著眼，而每用以借古諷今，批評時政，針砭時弊。這一天，他正講〈小雅·苕之華〉，當他念完末章「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之後，又接著把《毛傳》「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用非常低沉，幾乎是哀傷的聲音念了出來。既沒有對漢宋諸儒訓說此詩的異同加以討論，也沒有對經文和傳文作進一步的解說，但我們這些青年人的心弦却深深地被觸動了。……

老師的談鋒不知怎麼地一轉，又議論起中西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比較來。他由木版書便於批點，便於執持，便於躺著閱讀等等方便，而譏諷精裝西書為「皮靴硬領」；又談起中裝之文明和舒適遠勝西裝，他當即並不用手而把自己穿的布鞋脫下，然後又穿上，並且對一位坐在前排的同學說：「看，你穿皮鞋，就沒有這麼方便。」很顯然，季剛老師並不是什麼國粹主義者、頑固分子，他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一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他對於當時買辦階級全盤西化論者「外國的月亮也比中國圓」的論調，是非常鄙視的。這種開玩笑的中西文化比較論，只是他愛國憂民憤世嫉俗的一種表現而已。

下課鈴一響，老師抱起他那個黑布書包，走出教室。我們再沒有想到，這就是他給我們上的最後一堂課。<sup>15</sup>

這樣的教學場景，或許對身處現代大學教育體制的人們來說，應遠比古代的教學環境來得更容易理解，而大師的上課風采，也令人神往不已。《詩經》，在現代高等院校的課堂中，用現代的講授方式，繼續傳承下去。

<sup>15</sup> 程千帆：〈黃季剛老師逸事〉，《桑榆憶往》，收入《程千帆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卷，頁77-78。

## 二、戰後臺灣高校《詩經》教學生態的形成與分析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定名「國立臺灣大學」，依中華民國學制，將原各學部改稱學院，文政學部分出文學和法學兩學院，「科」改稱「系」，於文學院下設中文系，是為臺灣高等院校中文系教育之開端<sup>16</sup>。作為專書選讀之一的「詩經」課程，於三十九學年度（1950年9月開學）由屈萬里（1907-1979）開始講授<sup>17</sup>，之後又歷經多位教師持續教授，至今已近七十年矣。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臺灣省立文史專科學校升格為臺灣省立文學院，同年六月五日，又擴大改組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是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國文學系亦同時設立，張同光（1896-1971）任首屆國文學系主任<sup>18</sup>。一九四七年，時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的李季谷（1895-1968），自杭州藝專聘來高鴻緝（1891-1963）接替張同光為系主任，高鴻緝開始在該校講授《詩經》<sup>19</sup>。今以可見史料考察，臺灣高校中文系「詩經」課程的開設與講授，當以臺大和臺師大為最早，為《詩經》在臺灣學術土壤中的扎根與茁壯，奠定良好的基礎。而隨著中文系所（含碩士班、博士班）的蓬勃發展，更為《詩經》的學術發展與社會流傳提供良好的環境，誠如楊晉

<sup>16</sup> 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頁2；附錄，頁814。關於臺灣大學文學院接收與創立的詳細討論，可參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一書中之相關章節。

<sup>17</sup> 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附錄，頁990。案：在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文學科東洋學講座的課表中，即已有神田喜一郎（1897-1984）開設的「毛詩注疏」課程（昭和14、15年，即1939、1940年），見同上書，頁987、988。關於神田喜一郎在臺北帝國大學的教研活動，可參張寶三：〈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頁323-349；〈神田喜一郎先生傳（1897-1984）〉，《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頁651-654。

<sup>18</sup> 參鍾宗憲等：《師大與臺灣國學》（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10-11、190；林初乾：〈孕育臺灣上一代菁英的搖籃——臺灣師大前身臺北高等學校〉，《國文天地》，第32卷第1期（2016年6月），頁50。

<sup>19</sup> 參鍾宗憲等：《師大與臺灣國學》，頁13、190。又關於高鴻緝教授開設課程的記述，可參看程發軔：〈高鴻緝君事略〉，《中國字例》（臺北：三民書局，1981年），頁1；林初乾：〈臺灣師大國學名師剪影（三）——文字學名師高鴻緝〉，《國文天地》，第32卷第9期（2017年2月），頁42-48。案：這幾處資料記載高鴻緝來臺灣師範大學講學，講授科目有「文字學」、「古文字學」、「訓詁學」、「詩經」、「論語」、「孟子」諸科，惟不甚能確知其講授《詩經》始於何年。

龍在千禧年發表的〈詩經學研究概述〉一文中所云：

和《詩經》學發展關係比較密切的中文相關系所，五一年以前僅有臺灣大學與省立師範學院（臺灣師範大學前身）兩系，九八年則有：大學部五十八系、碩士班二十所、博士班十三所。中文系所多開有《詩經》的課程，研究所考試也有將《詩經》列為選考科目之一者，中文系所大幅度的成長，對《詩經》的研究與傳播當然具直接促進的作用。<sup>20</sup>

不過就實際的教學情況來看，在高校中對《詩經》的教授不會只局限於中文系所的「詩經」課程；在某些學校的通識教育中，也會開設相關的課程，如清華大學通識中心便有「文學經典：《詩經》選讀」之類的課<sup>21</sup>。即使課程名稱沒有出現《詩經》，但也有可能在諸如「中國文學史」、「詩選」（或歷代詩選）、「經學概論」、「群經大義」及「經學史」之類的課程中會涉及其中的內容。但若從課程的獨立性和《詩經》學術專業及經典傳承等角度來做全盤考量的話，中文系所開設的與《詩經》直接相關的課程，其所承擔的責任和所發揮的影響自然遠大於其他的課程，本文亦以此為主要關注的對象。

臺灣高校近七十年來所逐漸形成的《詩經》教學生態，可從以下幾個面向來觀察。首先，從教授者的學術專業背景來看，大致可以區分有經學、文學和小學（包含文獻）等三類。以經學專業來教授《詩經》的學人有高葆光（1898-1981，東海大學）、屈萬里（臺灣大學）、王禮卿（1908-1997，中興大學）、潘重規（1908-2003，中國文化大學）<sup>22</sup>、高明（1909-1992，政治大學）、余培林（1931-2018，臺灣師範大學）、洪國樑（臺灣大學、世新大學）、莊雅州（中正大學、元智大學）、林慶彰（東吳大學）、文幸福（臺灣師範大學）、林素英（臺灣師範大學）、江乾益（1956-2016，中興大學）、黃忠慎（彰化師範大學）、張寶三（臺灣大學）、彭

<sup>20</sup> 楊晉龍：〈詩經學研究概述〉，林慶彰主編：《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1950-2000》（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頁101。案：楊氏此文曾以〈臺灣近五十年（1949-1998）詩經學研究初稿〉為名，於2000年1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發表。

<sup>21</sup> 參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網站，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cgenews099/>。（教授者為王月秀助理教授），檢索日期：2019年2月28日。

<sup>22</sup> 陳新雄（1935-2012）回憶道：「直到民國六十四年，（潘重規）先生受聘為文化大學終身教授，其時我任中文系主任，乃請先生於研究所開『詩經研究』，余親率學生前往聽講。」（參氏撰：〈潘石禪師之詩經學〉，《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6年〕，頁21。）

美玲（臺灣大學）等。以文學專業背景來教授者，筆者記憶所及，有林明德於任教輔仁大學期間，在王靜芝(1916-2002)教授於一九八六年退休之後，接替開設此課。而著名的詩人楊牧（王靖獻）於一九九六至二〇〇一年間擔任新創校的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sup>23</sup>，亦曾在中文系開過此課。之後接替楊牧開課的許又方教授，其學術背景亦是以文學為主。此外，以新詩為研究領域的李癸雲（現任教於清華大學臺文所），在政大中文系任教時期(2002-2010)亦曾開過「詩經」課程。至於小學背景開設「詩經」課程者有陳新雄（聲韻學，臺灣師範大學）、蔡信發（文字學，中央大學）、季旭昇（文字學，臺灣師範大學）、李添富（聲韻學，輔仁大學）和呂珍玉（訓詁學，東海大學）等學人<sup>24</sup>。

但須聲明的是，以上所列舉只是個大概，而且經學、小學與文學這樣的學術專長的區分，施之於某些學人身上，有時也並不是那麼明顯。尤其對小學名家的學人來說，他們對經書的理解和教授往往也是用經學的方式來進行的。甚至某些講授和研究《詩經》的學人，其學術訓練就兼具經學和小學，如戰後第一代的學人屈萬里、高鴻縉、高明，第二代的學人陳新雄、洪國樑、蔡信發，和第三代的學人季旭昇、李添富、張寶三等皆屬之。又有依違於經學和文學之間者，雖會強調《詩經》的文學性，亦會從文學辭章的角度看待《詩經》，而且也不具有太強烈的經學意識，對經學並不會做太多的強調和標榜。但其研究和講授仍是以傳統《詩經》學為基礎者，第一代學人若輔大的王靜芝、臺大的裴溥言（普賢，1921-2017），第二代學人若政大的朱守亮等皆屬之。

其次，學術專業背景的不同，勢必會導致講授方向的差異；具備小學專業者，對字詞文意甚至聲韻關係的強調，應該就遠超乎不具此專長的講授者。文學專業背景者，對《詩經》作品之文藝層面的講授，理應為其當行本色。從經學角度教授《詩經》者，傳統《詩經》學之重要關節和對《詩》義的闡發方式，當為其主要教授的內容。這當中較大的差異，是因授課者秉持其專業素養，對《詩經》或有偏向傳統經學式的理解與授課方向，亦或有朝向文學甚至歌謠的角度來教導學生者。而因為理解和教授路數的不同，也使得「詩經」，或者被視作文學類的科目，或者被

<sup>23</sup> 參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網址：<http://chass.ndhu.edu.tw/files/11-1015-16584-1.php>，檢索日期：2019年2月28日。

<sup>24</sup> 上述資訊，除潘重規者外，大多為筆者耳目聞見所及，兼亦有詢訪當事人所得，如莊雅州教授者。惟此授課名單只是例舉式的說明，並非全面性的整理羅列，實際遺漏者仍尚多。



歸類為經學類的科目。這種經學／文學二元的屬性，在其他經籍中是較少具有的<sup>25</sup>。但教授者的學術專長與其實際教學取徑相一致的現象也不可一概而論，固然有如高鴻縉這種專精文字學的學人，在教授《詩經》時擅用文字學與《詩經》相互印證闡釋者<sup>26</sup>；但也仍有在其學術專業之外，嘗試運用不同的取徑來教授者，如專攻古代漢語和訓詁學的呂珍玉教授，自述其在《詩經》教學上秉持的觀點即為：重視文本、活化經典、開放經典多元解釋。如此勢不可免地須兼顧《詩經》的詩歌性與文學性，並盡量拉近與現代社會的連結<sup>27</sup>。這種多元取徑的教學方式，在今日古典氛圍日益疏離陌生的整體社會文化環境中，相信也是不得不然之舉。

第三，教材的選用也呈現出頗為紛歧的情況，「詩經」課程所需要最直接的授課依據，主要就是包含《詩經》原文（全部或部分）和相關說解（註釋、題解、翻譯等）的教材，以及相關輔助教學的讀物。大致來說，授課者所選用的教材包括既有現成的教材和自編教材兩大類。前者包含古注和今人所撰的注本，後者則是授課者自己所編寫的《詩經》講義。古注中較具代表性的有漢人的《毛傳鄭箋》、唐人的《毛詩注疏》、宋人朱熹的《詩集傳》。今人的注本中較著者有陳子展(1898-1990)的《詩經直解》（范祥雍、杜月村校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1版）、程俊英(1901-1993)和蔣見元合撰的《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版）、屈萬里的《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初版）、王靜芝的《詩經通釋》（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1968年初版）和裴溥言的《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初版）。而在授課者所自撰教材中，除上述屈萬里、王靜芝和裴溥言有編撰過讀本外，尚有朱守亮所撰之《詩經評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初版）、余培林的《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初版）、黃忠慎的《詩經全注》（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8年3版）和呂珍玉的

<sup>25</sup> 中國古代史名家杜正勝嘗自述於1970年代在東吳大學講授中國古代史，於西周部分相當著重《詩經》，將之當作史料來利用（參氏撰：〈我所認識的白川靜教授——譯本新版跋〉，《詩經的世界》〔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年〕，頁311）。只將《詩經》當作史料來教授，在臺灣中文學界的「詩經」課程中，應不致形成主流的講授方式。

<sup>26</sup> 據曾旁聽過高鴻縉「詩經」課的陳弘治教授回憶道，高教授講到《詩經·有女同車》時，「先生會在黑板上畫出古代馬車與甲骨文『車』字的『前後所視輪、轂、輻』之形給同學看。講解生動，引人入勝，令人印象深刻，歷久不忘」。參林仍乾：〈臺灣師大國學名師剪影（三）——文字學名師高鴻縉〉，頁44。

<sup>27</sup> 呂珍玉：〈自序〉，《詩經鑒賞讀本》（臺北：新學林出版公司，2015年），頁VI。

《詩經詳析》（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年初版）、《詩經鑒賞讀本》（臺北：新學林出版公司，2015年）等書。這些教材皆有正式出版，從學術的角度來說，自然代表作者個人及戰後臺灣《詩經》學界之整體學術水平。而從經典普及與推廣的層面來看，這些《詩經》注釋讀本也嘉惠了廣大無緣修習高校《詩經》專業課程的讀者。

而作為教學輔助的讀物，雖然數量不多，但在教師授課和學生學習上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林慶彰教授曾於任教東吳大學中文系期間，編輯出版過兩冊《詩經研究論集》，其第一冊〈自序〉謂：蒐集三十五篇論文，依其個人之理解，將這些論文分成五個部分。其編輯目的在於希望學習者「能因此而增進《詩經》之知識，並習得些許研究之技巧」，如若能「間接影響《詩經》研究的進步，可說是一種意外的收穫」<sup>28</sup>。

第四，就課程的傳承和經營來說，戰後近七十年來的發展亦頗有可述者。以保存系史資料最為完善的臺大中文系來說，從其歷年系所的課程表中，可以看出此課程開設的明確軌跡。大學部自三十九學年上學期由屈萬里開始講授起（上、下學期，3學分），直到五十二學年上學期方改由何定生（1911-1970）接替。五十九學年上學期由張敬（1912-1997）教授，五十九學年下學期又由裴溥言接手此課；直至八十學年才改由洪國樑教授，中間只有六十四學年是由楊承祖（1929-2017）代上一年。九十學年之後又改由張寶三講授，自一〇二學年之後則由彭美玲負責此課<sup>29</sup>。

從六十二學年開辦的夜間部課程，直至八十學年之間，「詩經」一課分別由裴普言、楊承祖承擔。八十一至九十學年的夜間部／進修學士班，曾授此課者有洪國樑、張健和張寶三。九十一至九十九學年的進修學士班中，曾授此課者有張寶三和彭美玲<sup>30</sup>。

至於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的課程中，則從四十六學年上學期開始，有屈萬里的「詩經」，五十二學年上學期改由何定生教授，五十九學年上學期由張敬教授，五十九年下學期又由裴溥言接手。此時的「詩經」課應是與大學部合開。至六十六

<sup>28</sup> 參林慶彰：〈自序〉，《詩經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1冊，頁IV。案：此書第二冊出版於1987年。

<sup>29</sup> 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附錄，頁990、995、1000、1007、1014、1021、1027。

<sup>30</sup> 同前註，頁1064、1066、1072、1076。

學年上學期，裴溥言才又在研究所開了「詩經研究」，七十二學年上學期又改開設「詩經學」的課程。但自七十六至九十學年之間，完全不見有《詩經》相關課程的開課紀錄。直到九十三學年下學期，張寶三才又開出「東亞詩經學研究」，九十四學年上學期開設「詩經研究」。最近一次的開課紀錄是九十九學年下學期的「詩經研究」<sup>31</sup>。

從此開課紀錄中，可整理出迄今共有屈萬里、何定生、張敬、裴溥言、楊承祖、張健、洪國樑、張寶三和彭美玲等九位學人承擔此課程；其中屈萬里、何定生、張敬、裴溥言屬於戰後第一代學人，楊承祖、張健屬於第二代學人，洪國樑、張寶三和彭美玲則為第三代學人。這個師資陣容是極為整齊的，其中裴溥言施教逾二十年，為臺大《詩經》的教學和研究樹立了良好的學風。裴溥言雖自述其於一九五九年任教菲律賓華僑中正學院時，因為教學生「國學導讀」，引發撰寫「《詩經》欣賞」的興趣，一九六四年在三民書局出版了與其丈夫糜文開(1908-1983)合撰的《詩經欣賞與研究》初集，而且更在一九六五年後在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代其夫講授過「詩經」<sup>32</sup>。由此可知，她本已在《詩經》的教學與研究上有相當的基礎，但在現今留存的屈萬里書信中，卻可看到數封屈萬里與她討論《詩經》研究與教學方面問題的函件，其中標為第二封的「八月七日」函件，當作於一九六九年，屈萬里回覆她道：

承示治《詩經》情形，具見功力之勤。《詩經》一書，所涉甚廣，如聲韻、語法、禮俗、史事等，此書皆有重要之資料。文學欣賞，亦其一端。然欲從事以上各項研究，則必先了解《詩經》之文辭，欲了解其文辭，則不能不熟悉先秦之訓詁，欲熟悉先秦之訓詁，則與《詩經》有關之先秦經籍，乃至鐘鼎文字，即不能不讀。故弟意：(一)《詩》三百五篇，必須背誦甚熟；(二)關係密切之《尚書》、《易》卦爻辭、《左傳》，必須讀至上口；(三)《三禮》(尤其《禮記》)、金文、重要先秦諸子、《史記》、《漢書》以及考古學、民族學等書，亦須注意瀏覽(《詩經》之重要注釋，自應多閱，不必論)(字書之類，則《經籍纂詁》必不可少)。如是根柢既固，則創見必多。

<sup>31</sup> 同前註，頁 1035、1038、1042、1046、1055。

<sup>32</sup> 裴溥言：《溥言雜憶》(臺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 69；〈自序〉，《詩經研究指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頁 1。

先生年華方富，從事斯業，前途正未可量也。承詢及芻蕘，遂有芹曝之獻。有無一當，敬請卓裁。<sup>33</sup>

又標為第三封的「三月七日」函，當作於一九七一年，屈萬里當時客座於新加坡南洋大學，他從海外覆函給剛開始上「詩經」課的裴溥言，函中說道：

迭奉手示，敬悉一一。「詩經」課既順利解決，至為欣慰。弟日前曾寄奉一函，此時諒達台覽矣。《詩經》就訓詁方面言，與《尚書》、金文關係密切，〈國風〉諸詩之時代背景，又與《左傳》、《國語》等書，有密切之關係。故此類書籍，自不能不特予注意。諒先生早見及此矣。……<sup>34</sup>

此二函皆涉及屈萬里對從事《詩經》教研工作，所需擁有的學養之強調<sup>35</sup>。具備此條件，方能於學術研究中有所創獲，以及勝任臺大中文系的「詩經」課程。

這兩封信寫作的背景，當是裴溥言甫接手臺大中文系「詩經」課程的重要時刻，屈萬里的信中，不但傳達出他對裴溥言繼任此課的支持，而且也對她如何增進本職學能，提供了寶貴建議。從中可以看見前輩學人對後進的提攜，以及對《詩經》教研經驗的傳承。

### 三、戰後臺灣高校《詩經》教學生態的評析與檢討

從屈萬里寫給裴溥言的信中可以看到，屈萬里對從事《詩經》研究與教學工作所樹立起的嚴格標準。然而究竟要具備什麼條件，或達到什麼標準，才能稱得上是理想的教授者？亦即一合格或稱職的「傳經（《詩經》）者」？鄙意或可從以下幾項指標來評判：1. 長期任課、2. 持續研究、3. 編撰教材、4. 指導學生（以碩、博士班

<sup>33</sup> 山東省圖書館、魚臺縣政協編：《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頁220。案：此提及：「剛伯先生已辭卸院長職務，由外文系朱立民主任繼掌本院，前日已接事矣。」（頁220-221）查臺灣大學文學院網頁，「歷任院長」欄中記載沈剛伯（1896-1977）的任期為「37.8-58.7」，朱立民（1920-1995）為「58.8-64.7」（[http://liberal.ntu.edu.tw/01/01\\_03.htm](http://liberal.ntu.edu.tw/01/01_03.htm)），則此函寫作年分確為1969年。

<sup>34</sup> 同前註，頁221。案：據劉兆祐所撰《屈萬里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謂屈萬里於1970年夏，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聘，為該校訪問教授，講學一年（頁196），則此函寫作年分確為1971年。

<sup>35</sup> 屈萬里在《詩經詮釋》的〈敘論〉第九節「我們怎樣研讀《詩經》」，對有志精研《詩經》者提出了一番期望意見（頁23-24），可與此兩函參看。

研究生攻讀學位之論文指導為主)。「詩經」課程的理想教授者，當然首先要有在高校開設《詩經》相關課程的事實和經驗，且這上課經驗並非偶一為之，斷斷續續的，而是經常開、長期上，如此方能累積豐富的教學經驗。由於高等教育不同於中小學的基礎教育，所以必須對教學內容所涉及的學科專業領域，不斷地有所鑽研，掌握該學科領域的前沿知識，如此才能在講授中持續更新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提出自己的創見。因而，有否持續研究，也構成了對當代從事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能力指標和績效考核中的重要項目。教材的編撰也是觀察教學者教學能力和教學內容的重要指標；理想的教學模式中，應該是教學者能自行編輯教材講義，甚至編寫教科書，而非停留使用他（前）人的教材的階段。對「詩經」課程而言，若授課者能自行編撰包含原文、解題、註釋、翻譯和評析的讀本（全本或選本）及相關輔助讀物（如研究論集），於其教學專業能力之展現和個人學術聲望之建立，關係匪淺。更有甚者，若有一部成功的、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教科書，則更有可能跨出高校的學術殿堂，向中小學及社會傳遞其知識和價值觀，從而參與形塑其所存在的時代之文化風貌和學術內涵<sup>36</sup>。而指導學生，對於《詩經》經典和學術之傳承，更具有莫大之干係。學生後進之持續不斷進入《詩經》研究之領域，方能將研究的動能延續下去。

若持此四項指標去檢視戰後近七十年臺灣高校《詩經》教學的成果，可以發現，四項皆備者並不甚多。雖然大多數「詩經」授課者於實際教學、學術研究和指導學生方面皆有具體表現，但在編撰教材讀本方面，似乎並不十分熱衷。竊以為，第一代的屈萬里、王靜芝、裴普賢，第二代的朱守亮、余培林、林慶彰和黃忠慎，第三代的呂珍玉等學人，皆符合上述四項指標；除了在實際教學、學術研究和學生指導方面，貢獻卓著外，他們皆至少編撰一種可作為上課教材的《詩經》讀本（全本、選本；譯注、賞析等）或輔助讀物<sup>37</sup>。從《詩經》傳承的角度來評判，堪稱當代

<sup>36</sup> 案：教科書實具有建構社會知識和價值觀的作用，在經過時間變遷後，便會在社會上有所體現。相關討論請參朱維理：〈1960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本與二戰歷史記憶〉，《思與言》第55卷第2期（2017年6月），頁126-130。若從教科書的角度來看待朱熹的《詩集傳》，該書無疑對十三世紀以來東亞地區士人《詩經》知識的習得，甚或社會庶民價值觀的陶塑，皆產生相當程度的積極作用。

<sup>37</sup> 此處純粹從正式出版與否的標準來衡量。不能排除亦有授課者自行編撰教材讀物但未正式出版，僅以課堂講義的面目存在的狀況，這類授課者的教學熱誠與用心同樣值得欽佩。本文所論僅限於將教材讀本公諸於世，付梓刊行者；蓋相較之下，這類資料的明確性與正式性還是遠高於未正式出版的課堂講義。

臺灣高等教育界中理想的《詩經》「傳經者」。

不過，若回到實際的教學實務中來觀察，其中也存在若干可供深思檢討之處。首先，是關於對《詩經》性質的認識，以及教授者用什麼方式，基於什麼學術背景來講授？如臺大的柯慶明教授就曾對屈萬里用傳統經學，以及龍宇純從聲韻學的角度來看待《詩經》，表達了極度的不安。他回憶屈萬里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剛接任臺大中文系系主任時，在暑假過後，為了歡迎新生入學，特別為他們作了場題為〈於無字句處讀書〉的演講，演講前半部舉《孟子》的例子，後半部則講到《詩經》，柯慶明記述道：

屈老師又舉《詩經》〈關雎〉的首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也以為屈老師可能是要提醒大家，上了大學男女同學交往，不免會有愛悅之情，但應「發乎情，止乎禮義」。結果屈老師又問大家：「你們知道，這位君子是誰？淑女是誰？」然後按照前人的周文王、周武王等舊說，提出他們的生平事跡，作了一番檢討。

我一方面很佩服屈老師讀書的細心，能注意一般人所忽略的細節，而配合博覽的歷史文獻資料，確能見人所未見。但另一方面卻帶給我極大的不安。因為我無法贊同這就是我們讀《孟子》或讀《詩經》的目的。（後來龍宇純先生回系任教並且接了系主任，他公開說到《詩經》除了可以作「韻腳」，擬測古音之外，他看不出有什麼其他的用處！亦帶給我類似的不安。）<sup>38</sup>

對心有定見的柯慶明來說，他會對用傳統經學和小學的路數來講授《詩經》感到不安，而他的不安正好也反映了《詩經》理解方式的紛歧。強調文學欣賞的糜文開、裴普賢夫婦在撰寫《詩經欣賞與研究》時，原擬單刀直入，撇開「詩序」、「詩柄」等不管<sup>39</sup>，只寫自己意見。可是雖有許多讀者來信讚美，但也有不少讀者來信責難，要求羅列異說，加以討論。為了滿足讀者的要求，他們便不得不在有些篇章，歷敘各家主張異同，再加研判<sup>40</sup>。他們所歷敘的各家說法，大多數都離不開傳統經

<sup>38</sup> 柯慶明：〈談笑有鴻儒——懷念屈萬里老師與在第三研究室的日子〉，《昔往的輝光》（臺北：爾雅出版社，1999年），頁99-100。

<sup>39</sup> 據崔述（1740-1816）《讀風偶識》卷一云：「朱子《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俗謂之『詩柄』。」見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524。

<sup>40</sup> 糜文開：〈自序〉，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臺北：三民書局，1985年），第1冊，頁3。

說。可見即使用文學的眼光看待《詩經》，仍然不能脫離傳統經說，糜文開與裴普賢的寫作方式，是合乎《詩經》學術專業的要求，也是負責任的做法。

其次，雖然在研究與教學中都很難完全甩開傳統經說不顧，但在以儒家經學為主導的舊說中，其某些說解內容在今日社會中，也確實存在著不少不合時宜之處。屈萬里沿用《毛詩》舊說，從周文王生平事蹟入手，為學生講解〈關雎〉，即已讓專研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柯慶明為之「不安」。但這僅只是毛、鄭《詩》說附會歷史的說《詩》方式，其對〈二南〉的詮釋，更是充斥著后妃之德的《詩》教論點，諸如〈關雎〉之「后妃之德」、〈葛覃〉之「后妃之本」、〈卷耳〉之「后妃之志」、〈兔置〉之「后妃之化」，〈樛木〉、〈螽斯〉、〈桃夭〉之強調「不妒忌」，而能「逮下」，且「子孫眾多」……等論點，皆已與當今社會型態與男女婚姻關係，極不相合。至若〈小星〉所謂之「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更不知如何於課堂中公開宣講？

而朱子之淫詩說，雖頗能窺見〈國風〉婚戀情詩本質，然朱熹過度泛濫的衛道思想，於此類詩皆痛加貶斥，如謂〈蟋蟀〉：「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sup>41</sup>又嚴厲指責〈鄭〉、〈衛〉之詩：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sup>42</sup>

這類說解《詩經》的方式，縱使不一定會對學生造成理解的障礙，但多少也會增加講授者的難度。而最終面臨對其經說內容的取舍時，若不是採全面批判的態度，也只能用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但若只能將其放在特定歷史脈絡中來理解，或其義理只適用於帝制時代的傳統社會中，那麼《詩經》又如何能將其視作是一部歷久不衰，具有不刊鴻教的經典呢？

第三，關於《詩經》的講授方式，大體有按照《詩經》既有編排方式，以〈風〉、〈雅〉、〈頌〉的次序，逐篇教授；以及根據一定的分類架構，以主題呈顯的

<sup>41</sup> [宋]朱熹集撰，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49-50。

<sup>42</sup> 同前註，頁88。

方式來教授。而這種模式也表現在講授者對相關教材讀本的編撰策略中。具有豐富教學和編寫讀本經驗的呂珍玉教授嘗對此二種模式的得失取捨，做過一番比較：

目前所見《詩經》研讀書籍多按〈風〉、〈雅〉、〈頌〉編訂次序編排，這樣的編排好處是保留原書次序，將同一區域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可以瞭解該地風土人情、政治興衰、社會生活，而且方便配合舊注閱讀，讀者可以順著編排體例鳥瞰縱覽，瞭解《詩經》全書形貌。相對的，這樣的編排也必然存在缺點，就是無法全面考察漫長五百年，東西橫跨齊魯陝甘，南北縱貫黃河江漢流域廣闊疆域周人的文化內涵。若能依其表現內容，呈現精神樣貌加以分類，則可以更加快速進入到周人的心靈世界，瞭解他們的性格特質、生活方式、思想特徵、文藝表現。因此本書打破一般慣例，在繼拙作《詩經詳析》之後，思考按照表現內容、文化精神編排的優點，嘗試將《詩經》內容分為愛情婚姻、征行、祝頌、生活、人物、憂患、政治社會諷刺、倫理、習俗、開國創業、農牧田獵、祭祀祝禱、懼讒、態度與價值觀、宴飲等十五篇，每篇更就其表現內容細分為若干類型，選取〈關雎〉等一百三十首詩作為閱讀賞析。<sup>43</sup>

按照原書次序授讀，優點是可以讓學習者認識《詩經》的原貌，但卻有失之於零散的缺點。主題呈顯的優勢在於較易傳授系統整合的知識，但其缺憾卻是將原典拆散重組，無法使學習者了解原典編排之用心；且用主題分類來編撰的讀本，通常也都僅為選本。以此方式來講授《詩經》，亦僅能選講有限的詩篇。但無論是用什麼方式講授，對有三〇五首詩篇的《詩經》而言，無論是一學年上下學期四學分，或單學期三學分的授課模式，都很難在學期有限的時間內，予以完整講述。以上下學期四學分的課來說，一學期十八週，上下學期共三十六週，每週二學分，則共有七十二小時的授課時數。平均每個鐘點要講四・二三篇，才能將三〇五首詩全部教完。而單學期三學分的課，亦共有五十四小時的授課時數，平均每個鐘點須講授五・六四首詩方能全部上完。繼屈萬里在臺大教授《詩經》的何定生，他在一九六五年元月九日的日記中曾記述他教授「詩經」課的情況：

<sup>43</sup> 呂珍玉：〈自序〉，《詩經鑒賞讀本》，頁V。案：中國大陸《詩經》名家夏傳才(1924-2017)，在2007年出版的《詩經講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書中，也是採用主題分類的方式，來選講百首最具代表性的詩篇。



授《詩經》已至〈杕杜〉(〈唐風〉)即第一百十九篇。較去歲進度高，依此進度，今年或可授二百篇以上。<sup>44</sup>

但也僅及於《詩經》全帙的三分之二，可見若想要在課堂中盡可能地完整講授《詩經》，該是多麼困難！

最後，關於記誦與吟讀的問題，也有值得檢討之處。上引屈萬里在寫給裴溥言的信中強調「《詩》三百五篇，必需背誦甚熟」。老一輩學者的確重視基本古籍的記誦之功，如汪辟疆(1887-1966)在〈讀書說示中文系諸生〉一文中便建議：

如《詩經》、《禮記》全文，及《漢書》、《莊》、《荀》、《騷》、《選》、杜詩名篇，皆宜背讀。且不僅背讀也，更宜時時溫習而背誦之。則終身用之不盡矣。<sup>45</sup>

高明亦曾在公開場合中，從研治國學的角度強調背誦的重要性：

至於最基本的書，最好能熟誦，曾國藩在他的家書裏告誡子弟們說：「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過去的讀書人，誰都能背誦《四書》、《五經》，根基那樣好，研究而有成就的還不太多。現在研究國學的人，如果連一兩部最基本的國學書都沒有熟誦過，那還談什麼根基？那還有什麼研究的成就？要想建築成什麼輝煌的學術殿堂，豈不是緣木而求魚？<sup>46</sup>

現在時空環境有很大的改變，不易太過硬性規定學生背誦，但在某些教授者的課堂中，則改成在考試中用默寫的方式來引導學生記誦詩篇。不過默寫只能訓練學生將作品用默讀的方式背誦在心中，無與於詩篇的音節、韻律等聲音的層面，惟有透過誦讀、朗讀，甚或吟誦、吟唱，方易於對詩篇的聲情有所體會。但現今臺灣中文系的教學，早已不時興這一套<sup>47</sup>。如何將這方面技能的培養落實於包括《詩經》在內的古典文學的課程中，此亦是值得相關從業人員深思的問題<sup>48</sup>。

<sup>44</sup> 轉引自楊晉龍：〈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00年6月），頁17。

<sup>45</sup> 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66。

<sup>46</sup> 高明：〈國學的研究法——在民國六十六年國學研究會講〉，《高明文輯》（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上冊，頁106。

<sup>47</sup> 其實朱自清早就說過，五四以來，中等以上的國文教學即已不興朗讀那一套的教學方式。見氏撰：〈論朗讀〉，《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冊，頁147。

<sup>48</sup> 據任教於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的林晉士教授自述：他在還沒入學時，他的父親除了教他認字外，還要求他背書。他回憶道：「從《昔時賢文》、《唐詩三百首》到《詩經》，一路背了下來。然後

#### 四、教學與研究關係的反思

本文經由對戰後臺灣高校《詩經》教學生態的回顧與檢討，嘗試呈現近七十年臺灣《詩經》學發展的圖像。而這幅圖像勢必會與著重於研究成果的相關論著大不相同（如楊晉龍的〈詩經學研究概述〉）。大多數對現當代經學的回顧與研究都是以學人的學術表現和成就為主，鮮少聚焦於他們的教育活動上（除了在建立學術系譜時，會特別強調畢業學校和授業老師的傳承關係之外），對經學工作者看重的是他們在學術研究上的表現，而非在教學和作育人才上的貢獻。因而對《詩經》學者成就的評判，也就容易呈現重研究輕教學的情況。而這樣的態度又適與現代學術體制的趨向是相一致的。蓋教學的成果不容易被文字化而得以流傳後世，研究則反之，此亦有其不得不然之處。然而，這樣的觀察視角無疑是偏頗的，無法從教學的面向來掌握與衡量學術的發展與傳承，如此所得出的學術史的圖像仍然不能說是完整準確的。

事實上，就中文系所的教學實務而言，過度重視研究，不見得有利於教學的推動。很多專精細碎的研究成果並不完全適合於課堂中講授，尤其是基礎性和通識性的課程，所教授的內容仍應以基本和共通的知識為主，亦即那些能夠和已經寫入教科書中的相關研究成果。總體來說，授課的目標應以知識傳承為主，奠定學生的基礎，啟發學習的興趣，提供完好的訓練。

但教學與研究二者之間不應該呈現斷裂的關係，不但教與學可以相長，教學與研究也同樣可以相長。從古人，若孔子、鄭玄、朱熹的言談身教中，皆體現了教研合一、教研相長的精神。現代學者的教學經驗中，也不乏類似的狀況，如研究重心以屈賦為主的蘇雪林(1897-1999)教授，曾於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間應聘至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教書；她自述系方要她接替病死於新加坡的高鴻縉教授遺留下的「詩經」課程，從未研究過《詩經》的蘇教授，剛開始時也著實惶恐不已。她回憶在陳鐵凡(1912-1992)教授的鼓勵下：

---

在隔天早起做操時，考校一番。」而他後來也帶著孩子讀詩，當他聽著從幼兒口中發出琅琅的誦詩聲時，又使他彷彿想見小時候與父親背詩的情景（見氏撰：〈自序：我讀詩經〉，《來自遠古的情感密碼——詩經的第一堂課》〔臺北：圓神出版社，2008年〕，頁9、11）。林晉士教授自身的記誦經驗雖然仍屬於家庭式或童蒙式的教育，但從他的例子還是可以看到，傳統經典和詩文作品的記誦，仍然是可以在現代教育環境中保存下來的，只是要不要做和如何做的問題。

我依其言壯膽上課，果然沒有出什麼岔。且虧教《詩經》，自加研究，獲得不少有關《詩經》的知識，遂寫了一篇〈詩經通論〉，把詩論常識介紹給學生。……他們都欣喜地說這篇講義勝讀十幾部有關《詩經》研究的書，叫我們明白《詩經》究竟是什麼一門學問了。我也知道了一位教師多教一門新功課，固不免辛苦，但他自己也可增進學問，教起書來更可左右逢源，揮發無盡，可以贏得學生欽敬，儒林尊重。<sup>49</sup>

從較理想的角度來看待二者的關係，應是教學可以帶動研究，甚至引領研究的方向；而研究亦可以支援教學，甚至形塑教學的內涵。研究與教學、教學與研究皆是分不開的，以往對學術史的研究多關注於研究成果，但其實很多研究及著作皆是與教學相關的，如屈萬里的《詩經釋義》、王靜芝的《詩經詮釋》……等書，若無相關的教學活動，則這些著作是否能夠撰作出，或其內容風貌是否還會如此（如變成專題論著），都可能存在很多變數。

學人對《詩經》學術內容的傳揚和發揮，有不少是在課堂講授中表現出的，透過聲音、語調、表情與肢體動作，可以將講授者對《詩經》經文的豐富理解更加全面地演示出來。曾志雄對何定生在臺大中文系講授《詩經》的情況，曾做過十分細緻的描述：

何老師出現的時候，大家非常靜默地注視他。他個子不高、身材癯瘦、眼睛有神、神情肅穆、憂鬱而不帶一絲笑容，修長的臉龐，上寬下尖，頭髮稀疏而梳理得光亮，一看就知道是個注意細節而喜歡深思的人；最令人難忘的是嘴旁兩條深刻的直紋。講課時，咬字吐音時而高，時而低，就像在唱歌一樣，迭宕有致，然而高音和低音音域相差特別大；他的高音部分，明顯比一般人更高，因此他那帶京腔的國語也顯得特別好聽。他說話不徐不疾，配上高亢的發音，聽了之後令人印象深刻。教書的時候，一面唸詩句，一面在木板的講臺上來回深沉踱步。腳上烏黑發亮的尖頭黑皮鞋，在講臺上一下一下敲得「叩叩」作響，十分有節奏。臉上的直紋時而拉長，眼光時而凝視學

<sup>49</sup> 蘇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頁217-218。相關記述又參氏撰：〈自序〉，《詩經雜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iii。又其日記亦曾記道：「我以前每對學生言，《詩經》價值與民間〈十杯酒〉、〈十把扇子〉、〈五更調〉等，今稍稍研究《詩經》，乃深悔前說。」見《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1999年），第4冊，頁342，「1965年3月20日」條。

生，時而貫注地下，隨著授課內容而變化，就像一個詩人在那裏沉吟歎息，聽者這時仿佛看到了原作者在吟唱。雖然講的是一些平常道理，聽起來總覺得他在表演。他的一舉一動牽引住每個人的視線、呼吸和動作。我這時才明白到為甚麼這麼多人來聽課的原因。我覺得，他裏裏外外根本不同於系裏的其他老師，裝扮、用詞既西化，又不含蓄。

何老師上課要言不煩，善於抓住機會發揮，說話時表情也特別豐富，讓人印象深刻。比如說，《詩經》多次出現的「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一句，是很普通而淺白的詩句，不容易再用言語加以解釋；可是到了何老師的口裏，就演繹成：「同學們吶！這就是女人的哲學呀！她們一走就再沒機會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呀！」說的時候，語調特別深沉，節奏特別緩慢，兩邊的嘴紋特別拉長，本來鬆垂的眼皮也顯得特別下垂，同時一臉黯然、哀傷、無奈，踱步的節奏也跟著放緩放輕。古人說「一唱三歎」，這是最好的寫照。我想，這樣的聲情演繹，雖然話語不多，相信不但女生聽了深有感動，男生聽了，也能即時明白到古代婦女的互古悲哀。《詩經》中這句話前後一共出現了四次之多（《詩經》相同句子重複次數達到四次的並不多），聽了這樣的演繹，不難理解原句的感情，不難理解這句話為甚麼出現那麼多次。<sup>50</sup>

何定生的講授《詩經》，與黃侃可說是各有千秋，皆各自在當時聽講的學生心中留下強烈的印象，多年後透過文字將當年的教學實況加以描繪出來。從中，不但看到授課者的風采，更可以見到《詩經》是如何在大學的課堂中被傳承下來。

<sup>50</sup> 曾志雄：〈永遠的懷念——紀念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69-70。